

##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周国林 涂耀威

**摘要：**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关键词：**清代；四库馆；四书学；《大学》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5-0035-05

元仁宗延祐科举，第一次将朱熹注《四书》纳入科举考试的科目范围当中，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并延续至清末。这意味着科举凡考经问或明经的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课本，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参考书。明代科举取士，出现了大量为科举而撰作的四书学著述。至晚明，王阳明心学流衍，《四书》诠释呈现心学化趋势和多样化局面。明清易代，学人对理学末流的批判不遗余力，在《四书》中，不同社会结构的学术群体均给予《大学》较多之关注。《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朱熹变动原文，对《大学》改动尤多。王阳明又对《大学》做了不同于朱熹的诠释，建构了他心学思想的基本体系。因此，在《四书》中，相比《中庸》、《论语》、《孟子》而言，《大学》问题较多。清初，从理学回归原始儒学，成为普遍的时代要求，经学逐渐占据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四书学的研究变得经学化，将《大学》壁回《礼记》研究，成为新的研究取向。

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时，清初《大学》争论的多样化局面不复存在。“四库馆”对明代四书学的重省，《四库全书》“四书类”著录“存”、“取”的标准，在在昭示着乾嘉时期，清儒对四书学和宋学的认识，以及《大学》说的新方向。外在

形势的变化与内在学术理路的发展，促成了乾嘉学风转变，已为学界共识。然而，宋学向汉学转变的具体情况，却鲜有深究者。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中，可窥见学术史上这一重要转变的一些情况。

### 一、“四库馆”对明代四书学的重省

四书学的开创者为朱熹，四书学的普及与社会化功在科举。《四库提要》于康熙十六年（1751）御定的《日讲四书解义》有云：“自朱子定著《四书》，由元、明以至国朝，悬为程试之令甲，家絃户诵，几以为习见无奇”<sup>①</sup>。明代科举之法，取《四书》与《五经》命题，“制义”行八股文，“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sup>②</sup>。明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后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出，士人为科举程式设计，制义寻绎语脉，涵泳讲章，经义全从《大全》出。官方利禄的导向，影响民间所习经典的选择。为时文而解经，成为一时之风气，鲜有读程、朱理学注疏者，惶论汉、唐注疏。

官方学术权威与科举制义的标准，影响着明代学术与四书学。《四书大全》对明代四书学影响甚大。“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度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

收稿日期：2009-05-19

**作者简介：**周国林（1953—），湖北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涂耀威（1982—），湖北孝感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6“《日讲四书解义》”条，中华书局，1965年，第303页。下引简称《总目》。

② 《明史》卷70《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3页。

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于斯，亦足以资考镜焉！”<sup>①</sup>四库馆臣看到官方颁布《四书大全》后，明代学术的变化，“盖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此变何在？即发明经义之学不存。“有明一代，尊《大全》为蓍龟。沿及近代讲章，亦无非依傍《大全》变换面貌。乌知其渊源所自，不过如斯哉？”<sup>②</sup>此时，经籍的义理诠释，展转抄袭《大全》，陈陈相因，全为揣摩举业。新近有学者认为，《四书大全》是宋、元理学家成果集大成之作，反映了宋、元诸儒学说结集情况以及程、朱理学发展之趋势。而《大全》在清四库馆臣看来，非常鄙陋。“初，明永乐间，胡广等奉诏撰《四书大全》，阴据倪士毅旧本，潦草成书。而又不善于剽窃，庞杂割裂，痕迹显然。虽有明二百余年悬为功令，然讲章一派从此而开，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于是遂荒。”<sup>③</sup>其对明代四书学的消极影响，用馆臣的话说就是“《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sup>④</sup>。

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全为科举时文，不为解经。“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sup>⑤</sup>，“解《四书》者，惟以寻绎语脉为时文敷衍之具”<sup>⑥</sup>。科举制经，试《四书》义，本以明儒家之道；义理诠释，以朱注为参考。但明人时文，不仅不问《四书》本文经义，连朱子注义亦不究，只是因袭《四书大全》，“揣摩为取科第计”。《四库提要》说：“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sup>⑦</sup>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全不入四库馆之选，而明代四书学，此类著述占绝大多数。

“四库馆”对明代四书学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为科举“程式计”，流为讲章之学，陈陈相因。二、义理阐发，多阳儒阴释，好为异说。三、考证不精，学问无根柢。后两点，在对明人《四书》类著述的评鹭中，体现明显。这样的认识，影响着“四库馆”对明人《四书》类著述之“取”与“舍”，兹归入以下两节一并论述。

## 二、“四库馆”四书类著述取舍标准

明人有大量的《四书》类著述，《四库全书》“著录”比较少，大部分入“存目”。明后期，受阳明心学影响，四书义理诠释与程、朱理学多有不同。明人不少四书学著述义理阐释多有新见，也不乏考据精审者，均不在《四库全书》入选之内。这涉及“四库馆”选取标准，也可以说明乾隆时期官方对宋学的态度。

《四库全书》“四书类”著述，宋代著录 26 种（313 卷），存目 6 种；元代著录 11 种（143 卷），存目 2 种；明代著录 10 种（113 卷），存目 38 种；清代著录 15 种（160 卷），存目 53 种。从种类看，宋、元录多存少，明、清存多录少。我们且看四库收录的 10 种明人《四书》类著述及其评语，探讨“四库馆”对四书学、宋学的具体认识。

（一）《四书大全》，《四库提要》的评价比较低，已见上文论述。四库著录是为起警示作用。《四库提要》说道：“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余年士习文风之所以弊。盖示戒，非示法也。”<sup>⑧</sup>言外之意，本也不当著录。（二）蔡清《四书蒙引》，馆臣认为“体认真切，阐发深至，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sup>⑨</sup>，不似明代为“揣摩弋获”的讲章之学。（三）吕柟《四书因问》，馆臣的评价是“证诸躬行，见诸实事”，“不徒为训诂空谈”。<sup>⑩</sup>（四）周宗建《论语商》，馆臣认为“其言皆简要明通，足释训诂之轆轳”，“不与讲学之家争一句一字之出入”，<sup>⑪</sup>不与当时的讲章时文相同。（五）高拱《问辨录》，逐条辨驳《四书章句集注》疑义之处，虽与朱子之说不同，馆臣却以为“确有所见，足以备考而广见闻”。<sup>⑫</sup>（六）陈士元《论语类考》，考证《论语》名物、典故，馆臣说“于《集注》不为苟同，每条必先列旧说，而搜计诸书，互为参订”，于一切杜撰浮谈悉为纠正；（七）陈士元《孟子杂记》，馆臣认为“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卮言”，“有裨于经义”。<sup>⑬</sup>陈士元的两本书均长于考证。（八）赵南星《学庸正说》，馆臣说“词旨醇正，诠释详明，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

①《总目》卷 36 “胡广等《四书大全》”条，第 302 页。

②《总目》卷 37 “倪士毅《重订四书辑释》”条，第 309 页。

③《总目》卷 37 “陆陇其《三鱼堂四书大全》”条，第 314 页。

④《总目》卷 36 “四书类二”卷末案语，第 307 页。

⑤《总目》卷 36 “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条，第 306 页。

⑥《总目》卷 37 “王澍《大学困学录》《中庸困学录》”条，第 317 页。

⑦《总目》卷 36 “四书类二”卷末案语，第 307 页。

⑧《总目》卷 36 “四书类二”卷末案语，第 307 页。

⑨《总目》卷 36 “蔡清《四书蒙引》”条，第 302 页。

⑩《总目》卷 36 “吕柟《四书因问》”条，第 302 页。

⑪《总目》卷 36 “周宗建《论语商》”条，第 303 页。

⑫《总目》卷 36 “陈士元《论语类考》、《孟子杂记》”条，第 302 页。

⑬《总目》卷 36 “陈士元《论语类考》、《孟子杂记》”条，第 302 页。

为训解；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而始终归本于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sup>①</sup>（九）刘宗周《论语学案》，馆臣认为“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敕）正其失”，“其针砭良知未流最为深切”，“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学庸正说》义理诠释本于程、朱，《论语学案》不从良知之学，故均得以录入。（十）章世纯《四书留书》，馆臣以为此书“于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不规规于训诂；而亦未尝如讲良知者，至于滉漾以自恣”。<sup>②</sup>

以上所“取”，反映的是馆臣的治学旨趣。四库馆臣以为《四书》学第一义，为义理之学。朱子《四书》学，义理解最为精当。“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于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注解《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sup>③</sup>而同为义理解，朱子为先，力排阳明之说。《四书》学第二义，是训诂之学。《论语》、《孟子》之名物制度考证，皆为学问，经由考证才能得义理。能有此，方为四库所“取”。不符合此要求者，四库均入“存目”。

如《四库提要》说姚舜牧《四书疑问》解《大学》多与朱子异，沿姚江古本之说，“自为一解”，“穿凿附会，碍不可通”，“以朱子为支离破碎”，“以禅机诂儒理”，“怪诞不经”；<sup>④</sup>万尚《四书测》“《大学》、《中庸》，独尊古本，而议论宗旨则全入异端”，“姚江末流，其弊每至于此。不但李贽诸人彰彰耳目者然”；<sup>⑤</sup>鹿善继《四书说约》“其持论亦颇笃实，然学出姚江，大旨提倡良知，与洛、闽之学究为少异”；寇慎《四书酌言》“其学出于姚江，故是编多与朱子立异”，是明末狂禅之习。<sup>⑥</sup>诸如此类，均因义理解与阳明心学有关，故入存目。明人也有《四书》考证著述。《四库提要》认为明薛应旂“不长于考证，舛漏颇多”<sup>⑦</sup>，其书《四书人物考》“襞积割裂，以涂饰试官之耳目。斯亦经术之极弊。非惟程、朱编定《四书》之时不料其至此，即元延佑用四书义，明洪武定三场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sup>⑧</sup>又以陈仁锡《四书考》为“短钉之学”，摭拾简略，“至

丰坊古本《大学》，其伪托可不待辨，而仁锡乃为持疑之辞，则茫无考证，亦可见矣”；称徐邦佐《四书经学考》，“杂钞故实，疏漏实甚”。<sup>⑨</sup>

### 三、乾嘉时期四书学的转变

清开国至康熙朝，提倡程朱理学。康熙本人尊崇宋学，启用理学名臣，而至乾隆皇帝，则崇尚经术，讲求实用，视“穷究性理”为空疏。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纪昀、钱大昕、朱筠、王鸣盛等同登进士，皆博通经史之才。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纪昀为总纂，四库馆顿时成为考证学的大本营，《四库提要》也被认为是一部体现汉学考证治学精神的代表作。“四库馆”著录清人《四书》类著述，对考证要求就比较高。

一方面，四库馆臣承认朱子不长于考证。《四库提要》有言：“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于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sup>⑩</sup>另一方面又为其辩护，“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sup>⑪</sup>诚然，朱子于名物、度数也有所疏，但读朱子之书，当于大义微言，求圣人之道。馆臣也认同了某些明清之际大儒的《四书》著述，如孙奇逢《四书近指》、黄宗羲《孟子师说》，虽理涉心学，然不为空谈之说，反身求实行实用，也被四库录入，原因是他们讲求践履实行。

对稍后清人著述的评价，馆臣是严格要求的，不仅义理纯正，考证也要精核。以毛奇龄为例，四库将其《四书索解》、《大学知本图说》、《大学问》、《逸讲笺》、《中庸说》均入存目。是因为这几本书均以阳明之学阐释义理。《四库提要》说《四书索解》“其旨在于驳注，其迹乃似于攻经”，“蹈禅家机锋之习，则非欲诂经，直欲骇俗耳”；<sup>⑫</sup>《大学知本图说》“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大学问》“归于良知之说”；《中庸说》“与朱子章句互异，大旨以慎独为主”。但也著录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大学证文》三书，是因为考证原原本本，也有可取者。馆臣认为“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辩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覆

①《总目》卷36“赵南星《学庸正说》”条，第303页。

②《总目》卷36“刘宗周《论语学案》”、“章世纯《四书留书》”条，第303页。

③《总目》卷37“王步青《四书本义汇参》”条，第318页。

④《总目》卷37“姚舜牧《四书疑问》”条，第311页。

⑤《总目》卷37“万尚《四书测》”条，第312页。

⑥《总目》卷37“鹿善继《四书说约》”、“寇慎《四书酌言》”条，第313页。

⑦《总目》卷36“陈士元《孟子杂记》”条，第302页。

⑧《总目》卷37“薛应旂《四书人物考》”条，第310页。

⑨《总目》卷37“陈仁锡《四书考》”、“徐邦佐《四书经学考》”条，第313页。

⑩《总目》卷36“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条，第305页。

⑪《总目》卷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条，第294页。

⑫《总目》卷37“毛奇龄《四书索解》”条，第315页。

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蔓衍，不顾其安。至于考核事实、征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sup>①</sup>，若能弃（汰）短取长，《四书剩言》可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传。《论语稽求篇》是毛奇龄旁采古义，诂难朱子《论语集注》之书，其中考证，有强生支节者，有半是半非者，有全然无理者，但四库馆臣以为，也有考证特详，持论也正者，“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于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sup>②</sup>。

同时，馆臣要求清人《四书》类著述义理的阐释，要参考汉、唐注疏，以汉、唐注疏为先。清人王植撰《四书参注》，四库以为“是书多掇击注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意。而掇击郑玄、孔颖达尤甚于赵岐、何晏、孙奭、邢昺。然先有汉儒之训诂，乃能有宋儒之义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尽扫经师，独标道学，未免门户之私……且所采多近时王廷诤、崔纪、傅泰诸人之说，在诸人研究《四书》，固各有所得，然遽跻诸郑、孔诸儒之上，恐诸人亦未必自安矣。”<sup>③</sup>研究《四书》贵在各有心得，但是想超过郑玄、孔颖达，是为大过。清人焦袁熹撰《此木轩四书说》，四库将其著录，说是书“独能深求于学问”<sup>④</sup>，其言笃实。而其《杂说》一书，只有入“存目”，“以《礼记》中《大学》、《中庸》注疏及《论语》、《孟子》注疏与《朱子章句集注》，两两相勘，决择是非，而左袒朱子者为多，其中考证过疏……奈何于孔注疑之耶”，<sup>⑤</sup>四库以为焦袁熹不当疑孔注。

#### 四、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

乾嘉学者主张回归经典，尊经崇汉。朱熹改动《大学》本文，从《礼记》中将《大学》、《中庸》抽出来成为《四书》一部分，已成事实。《四库提要》有云：“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寢以成风。《大学》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于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sup>⑥</sup>此处述说改经之渊源，尤

显馆臣对改经者的不满。此处可见馆臣对《大学》的态度，即《大学》朱子改本，于理有益，但当知此本不为古本，即不是原典。四库馆臣评价朱熹《大学》解有云：“《大学》章句（何）？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于八条目外。既于理无害，又于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sup>⑦</sup>“四库馆”看到《大学》文本认识的不一，对朱熹“改本”持认同态度，其标准是“于理无害”。此“理”是程朱理学，儒家之圣道，不是王阳明异端之心学。馆臣以为，《四书》义理以宋人为胜，朱熹诠释最精。朱子之学为官方所认同，维护朱熹义理上的权威，理所当然。

这样，馆臣就将《大学》的研究分为两概，即《四书》之学和《礼记》之学，“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sup>⑧</sup>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礼记义疏》就将《大学》、《中庸》回归《礼记》，录古本原文，并将朱子章句与郑玄注、孔颖达疏并录。“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澧《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sup>⑨</sup>此一分类的转变，正萌蘖着乾隆以降《大学》认识以及研究方法的转向，即开始重视汉、唐注疏和古本。

馆臣以为三礼之学“《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sup>⑩</sup>《大学》、《中庸》为《礼记》之学，也应主义理。大抵《四书》之《大学》、《中庸》，以朱子义理为精。然《礼记》之《大学》、《中庸》，就要由考证推求义理。就《大学》而言，《大学》类专著，四库只录有胡渭《大学翼真》和毛奇龄《大学证文》。馆臣评价《大学翼真》：“引据精核，考证详明，非空疏游谈者可比”。在胡渭看来“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

①《总目》卷36“毛奇龄《四书剩言》”条，第305页。

②《总目》卷36“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条，第305页。

③《总目》卷37“王植《四书参注》”条，第328页。

④《总目》卷36“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条，第306页。

⑤《总目》卷37“焦袁熹《杂说》”条，第317页。

⑥《总目》卷36“毛奇龄《大学证文》”条，第305页。

⑦《总目》卷35“朱熹《大学章句》”条，第294页。

⑧《总目》卷21“经部礼类三《礼记》类”卷末案语，第176页。

⑨《总目》卷21“《钦定礼记义疏》”条，第172页。

⑩《总目》卷21“《钦定礼记义疏》”条，第172页。

以明人伦”，馆臣以为其解“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以五常百行之外别有一物谓之道，别有一事谓之学者，胜之远矣。”<sup>①</sup>馆臣说毛奇龄《大学证文》，备列《大学》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盖一则欲纲目分明，使学者易于致力；一则欲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sup>②</sup>毛奇龄众多《大学》著述，馆臣只取这一本，意在其考证与保存古经之功。胡渭《大学翼真》与毛奇龄《大学证文》的共同特点，是在体例上符合清儒治学精神，罗列诸经改本，原原本本。同时考证详明，于明丰坊石经之伪，力证其假。义理上，取胡氏述朱之功，同时，又能见原儒之意。至于其他人的《大学》著述，虽有学问功底，也因义理不醇被弃。清王澍撰《大学困学录》、《中庸困学录》，馆臣以为“是二书独发挥学问之功，其识在坊刻讲章上，而意取详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间有出入……辨陆王致知之误（说），极为分明，论心中不可存一物，则仍阑入金谿姚江之门径。”<sup>③</sup>清刘醇骥《古本大学解》，“遵用古本《大学》，不分经、传。首《大学考》，次《戴记中古本》，又次为《大学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诸人改本之非。夫窜易古经以就已意，其事原不可训。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复古本者，实欲引托始知本，不言格物之义，以阴助良知。非尽为尊经也”。<sup>④</sup>

## 五、结语

四库馆臣以为，只要对《四书》义理体认真切，能有己见，讲求履践实行，就可入选四库，但是，不能为讲章之学，不能受心学影响。在四库馆臣看来，明代的四书学著述，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受心学影响，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因此，四库馆著录了宋、元人大部分四书学著述，而对于明人著录较少。质言之，作为讲章之学的明代四书学，虽然也以程、朱义理为标准，但是这些四书学著述多为科举考试所撰写，内容重复，模拟章句，忽视了朱熹《四书》义理的精妙之处，抛弃了宋、元人发明经义的解经传统，更丧失了原儒重视经验世界伦理秩序、强调实行的精神。而馆臣对受心学影响的四书学著述的摒弃，不仅说明了当时官方对宋学的态度，也反映出馆臣对空虚学风的批判和对朴实学风的追求。

四库馆臣对明代四书学的重省，其内在的原因是清中叶学风的转变。义理阐释的醇粹、考证方法的精密，以及内容的切实，成为四库馆臣对清儒四书学的基本要求，也昭示者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总的而言，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馆臣还强调《四书》类著述义理的阐释，要参考汉、唐注疏，以汉、唐注疏为先。这一时期的《大学》研究，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在训诂考证之中，在回归原儒的义理诠释之中，清儒对“明明德”、“格物致知”等概念另作新解，也见证了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型。

##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and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ur Books (四书)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OU Guo-lin TU Yao-wei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editors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四库馆) believed that the theory on the Four Books (四书) in Ming Dynasty were sentence studies and had no question consciousness. Different from the Cheng Hao and Zhu Xi's dynasties, ther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were mental outlook system. The editors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emphasized the textual research in the studies of the Four Books (四书). As the theory on The Great Learning(大学), Schola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ancient copies of The Great Learning(大学) and annotation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 the Period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and thus transformed the studies of the Four Books from Neo-Confucianism to Confucian Classics, reflecting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he Four Books; The Great Learning

①《总目》卷36“胡渭《大学翼真》”条，第304页。

②《总目》卷36“毛奇龄《大学证文》”条，第305页。

③《总目》卷37“王澍《大学困学录》、《中庸困学录》”条，第317页。

④《总目》卷38“刘醇骥《古本大学解》”条，第320页。

（责任编辑：刘兵）